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7.2

一年出版4期，以17种语言刊出

杜特蒂对自由民主的反叛

Walden Bello

巴基斯坦社会学

Ayaz Qureshi,
Nida Kirmani,
Kaveri Qureshi,
Tania Saeed,
Amen Jaffer

纪念

Zygmunt Bauman

Peter McMyllor,
Maciej Gdula,
Peter Beilharz

加拿大社会学

Howard Ramos,
Rima Wilkes,
Neil McLaughlin,
Daniel Béland,
Patricia Landolt,
Cheryl Teelucksingh,
Karen Foster,
Fuyuki Kurasawa

特辑

> 美国大学：新的移民议题斗争场域？

> 介绍阿根廷编辑团队

MAGAZ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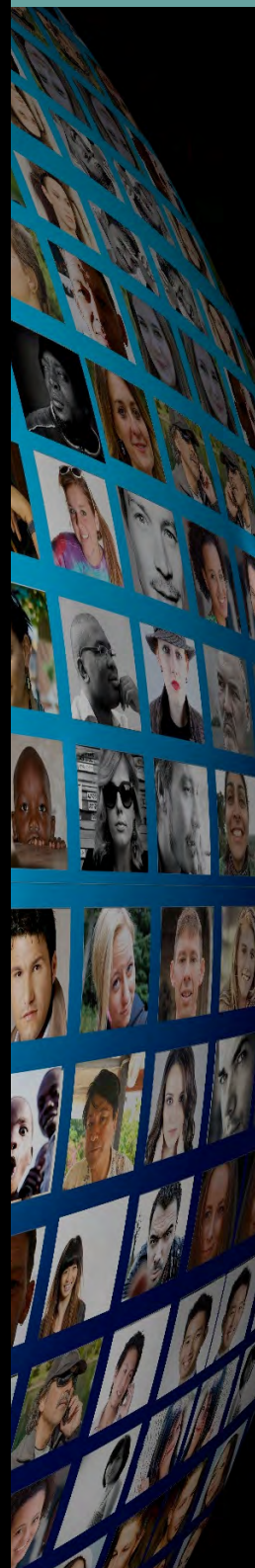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7卷 / 第2期 / 2017.6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编的话

反动年代的社会学

杜特蒂、埃尔多安、奥班、普丁、勒庞、莫迪、祖玛、川普，这些人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民族主义者、排外主义、威权主义。而川普的胜选也为非自由的运动和右翼独裁增添的能量。毫无疑问的，政治的反动浪潮已经酝酿了几十年了，而自由民主体制推进了第三波的市场化，助长了危险、排外、不平等的现状。1920 和 1930 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是现在反动的前身，起因于第二波市场化潮流。二战瓦解了这波市场化，但我们可以确定现在这波会被瓦解吗？自由民主的体制有多强韧？川普政府的前期我们看到了对于其行政命令的反抗。Portocarrero 和 Lara García 指出了这种反抗如何在大学校园中产生。那其他国家呢？这期 Walden Bello 描述了菲律宾总统杜特蒂的残忍统治，其兴起是可以归因给自由民主体制的失败的，因为推翻了代表美国外交政策支持的政治腐败、不平等社会的马可仕政府，杜特蒂就是诞生在这脉络中的。这个对于自由民主的缺点的政治响应可能透过民粹而出现，即使其是抗议宰制阶级的利益，但是却是妖魔化那些污名化的人口，像是吸毒者或是贩毒者。这就像埃尔多安妖魔化库德族人，川普妖魔化移民，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妖魔化非亚利安人种。的确，Bello 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对比太令人信服了。

巴基斯坦是个军事统治国家，其民粹的诉求伴随着经济力量的集中。巴基斯坦的社会学受到诸多限制，但是很有创意和批判性：我们看到这期的文章描述基础建设的发展如何让跨国企业受惠，波湾国家如何监控移工的身体，以及女性即使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没办法脱离家暴的困境。另外还有研究在英国的巴基斯坦移民婚姻关系和穆斯林学生如何受到安全政策的影响。这五篇文章显示了后殖民社会学如何超越了国家的边界。

很不同的是来自加拿大的乐观主义社会学，讨论关于移民和环境正义的议题。加拿大的社会学更紧密地和政策结合。尽管前总理 Stephen Harper 的鄙视，社会学在加拿大受到社会广泛的接受，他们失望的语气反映的是其对社会民主体制的高度期待。

若有任何的社会学家看到了这个时代问题的症结，那非 Zygmunt Bauman 莫数了。他于 91 岁过世。我们刊登了 3 篇的纪念文章，寄载了其传奇的一生，有着宏大的道德视野，并且抱持着怀疑的乌托邦梦想。Bauman 的社会学将会影响我们数十年之久。



Walden Bello 是学者、政治运动者、全球社会学家，描述菲律宾的杜特蒂政权。



巴基斯坦：来自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的学者的跨国社会学研究。



Zygmunt Bauman：纪念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家。



加拿大：骄傲且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出版社提供赞助。

全球对话以 17 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org)。

投稿请寄给 burawoy@berkeley.edu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副主编	Gay Seidman.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Mina Azizi, Mitra Daneshvar,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Miki Aoki, Masataka Eguchi, Mami Endo, Akane Higuchi, Yuka Hirano, Hikaru Honda, Yumi Ikeda, Izumi Ishida, Aina Kubota, Yuna Nagaye.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Katarzyna Dębska, Paulina Domagalska, Adrianna Drozdowska, Łukasz Dulniak, Jan Frydrych,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Łukasz Żołądek.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ș,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Costinel Anuța, Maria-Loredana Arsene, Tatiana Cojocari, Andrei Dobre,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Rodica Liseanu, Mădălina Manea, Mihai-Bogdan Marian,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Rareș-Mihai Mușat,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Ion Daniel Popa, Diana Pruteanu Szasz, Eliza Soare, Adriana Sohodoleanu.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编辑顾问:	Gustavo Taniguti.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反动年代的社会学	2
杜特蒂对自由民主的反叛	
Walden Bello, 菲律宾	4
> 巴基斯坦社会学	
波湾国家的医疗监控	
Ayaz Qureshi, 巴基斯坦	7
经济参与和对女性的暴力	
Nida Kirmani, 巴基斯坦	9
移民中的离婚	
Kaveri Qureshi, 巴基斯坦	11
恐伊斯兰症与英国的反恐安全政策	
Tania Saeed, 巴基斯坦	13
基础建设的政治	
Amen Jaffer, 巴基斯坦	15
> 紀念	
Zygmunt Bauman的道德视野	
Peter McMyler, 英国	17
Zygmunt Bauman：怀疑的乌托邦	
Maciej Gdula, 波兰	19
纪念Zygmunt Bauman	
Peter Beilharz, 澳洲	21
> 加拿大社会学	
非社会学时代的社会学	
Howard Ramos, Rima Wilkes, Neil McLaughlin, 加拿大	23
贡献社会学于公共政策	
Daniel Béland, 加拿大	25
加拿大危险的非公民身份	
Patricia Landolt, 加拿大	27
贡献社会学于环境正义	
Cheryl Teelucksingh, 加拿大	29
在就像(从未很像)任何其他时代中的社会学	
Karen Foster, 加拿大	31
动荡年代与媒体交手	
Fuyuki Kurasawa, 加拿大	33
> 特辑	
美国大学：新的移民议题斗争场域？	
Sandra Portocarrero, Francisco Lara García, 美国	35
介绍阿根廷编辑团队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阿根廷	37



> 杜特蒂对自由民主的反叛

Walden Bello, SUNY Binghamton大学，菲律宾国会前议员



老牌的复仇者Rodrigo Duterte，称为DU30（发音为“du-terte”）或是“处罚者”，Arbu绘。

纳粹的反革命胜利后，Joseph Goebbels说了有名的话：“1789年是被历史所抹灭的。”按照这说法，我们可以说美国、欧洲、其他地方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可说是把1989年从历史上擦掉吗？

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弗朗西斯福山和其它人在1989年说自由民主带来了历史的终结。欧洲和右翼的威权与共产主义的瓦解是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以及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将代表人类的理想政体。

福山的乌托邦很快的被反自由主义运动所挑战。主要是那些中东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和中东的排外主义者。但是没有运动或是个体可像杜特蒂对于自由民主那么鲁莽的拒绝。杜特蒂是2016年5月刚选上的总统。

> 铲除主义

杜特蒂的招牌政绩就是反毒战争。9个月来就处死了8000多人。这不是一个法治的政策。这是一个透过伪装成科学的纳粹种族主义理论的法西斯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把人民的生命权剥夺了，没有法治可言。杜特蒂认为吸毒者不需要被当成成人来看待——这些人超过3

>>

百万，总人口有一亿3百万人。他典型的说法是：“这是违反人性的犯罪？等一下，我想问：他们算是人吗？你们对人的定义是什么啊？”

把行刑杀戮证成是警察自我防卫，杜特蒂说吸食shabu——一个当地对安非他命的称呼——会造成脑萎缩，且不可完恢复。把吸毒者称为“行尸走肉”，“对社会没用”，杜特蒂称这些人恐慌且危险。杜特蒂授权警察无条件射杀吸毒者，的确，对于那些非法射杀吸毒者的警察，杜特蒂给予特赦，然后“可以去追杀那些检举你的人”。

尽管因为这些观点和选举承诺像是用那些毒贩的尸体去喂胖马尼拉湾的鱼，杜特蒂仍然是很受欢迎的。其支持率有83%，并且网民相当爱戴，并且发动网络肉搜去攻击那些批评杜特蒂的卫道士。

> 杜特蒂主义的源头

杜特蒂的群众基础从哪里来的？是的，其对吸毒者和毒贩所造成对社会的伤害受到了广泛的回响。但是还有其它因素。杜特蒂掌握了民众在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后所带来的自由民主主义政体的幻灭。事实上，所谓的“人民力量革命共和”——有一条道路以此为名纪念当时推翻马可仕政府的革命——的失败造成的杜特蒂的成功。

杜特蒂的路径是透过精英对于选举系统的掌控、财富的集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华盛顿对于外债常还得坚持。2016选举时，在人

民力量革命共和的承诺、财富重分配的愿景和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大量的贫穷，不平等，贪腐层出不穷。艾葵诺三世总统的无能也不意外让超过1千6百万的选民，40%的投票人投给了这个在南方城市Davao在位超过30年的人。如小说家Anthony Doerr对于战前德国人的描述，菲律宾民众“渴望一个对的人”。

此外，人民力量革命的论述：民主、人权、法制，对于许多菲律宾人来说已经太令人窒息了。杜特蒂的论述：赤裸裸的死亡威胁，直接的脏话，咒骂，并结合幽默称一个精英是coños或是臭机掰，这些证明了他号招大众的方式，其支持者对可以从令人窒息的精英伪善中获得解放。

> 法西斯的根源

杜特蒂的私刑政策，其跨阶级的动员能力，以及其政治权力，已经让菲律宾的美式权力分立体制瓦解了。这让他成为了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是一种特殊的法西斯主义。若传统的法西斯主义是透过侵害公民自由而掌权然后迫害，杜特蒂刚好颠倒，是先迫害，然后减少对公民自由的侵害，然后独揽大权，这是闪电战法西斯主义。

其他杜特蒂的政治手段特征是他邀请传统左翼政治人物入阁，这样的结盟对于以前的法西斯主义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不把左翼当作政敌，反而认为可以控制他们。同时，共产党和国家民主阵线也很高兴可以入阁，以挽救日渐下滑的政治影响力。

杜特蒂虽然是外交政策的新手，但是显示了对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熟稔与掌握。他在美国奥巴马总统批评他的扫毒政策后称其是“狗娘养的”，而其对中国的开放态度似乎在政治上是险棋，因为亲美主义是菲律宾的传统，可是令人惊讶的是他的举动鲜少受到反对，反而在网络上受到许多支持。就像许多人看到的，一般的菲律宾民众或许对美国制度景仰，但是对于美国的殖民历史却是有着很深的反感，包括了不平等的条约和美式文化的入侵。这里我们不用使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就可以了解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这种“争取肯任”的文化。杜特蒂已经抓到了菲律宾人民的这种心理，而左翼还抓不到。就像许多威权领导人一样，杜特蒂能够有效地结合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

> 修辞的民粹，实质的法西斯

虽然他的修辞相当民粹主义，但是杜特蒂毫不保留的说会利用大众去执行重分配政策。然而，像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者，他试图要平衡阶级力量并同时投射出一种超越阶级冲突的景象。选举期间，杜特蒂承诺要去中止临时契约劳动，管制矿业，然后帮助那些在马可仕政权下被不公平课税的椰子农民。但是那些承诺在政治精英成为他的盟友的时候都没有兑现。但是长期来说虽然那些经济改革对于其政治影响力是重要的基础，可是短期间没有改革却也不影响他的受欢迎程度。

目前政治上反对杜特蒂的力量还是很弱的。同样

>>

的，基督教势力向来是人权的支持者，也没有针对杜特蒂批判。教会因为自身的贪腐和固执的家庭计划立场，所以无能为力。反对势力只来自于少数的个人，像是参议员 Lila de Lima，现在因为被控告接受毒梟的贿赂而入狱服刑。或是来自少部份媒体，以及人权团体像是 I-Defend。

> 杜特蒂、菲律宾社会、社会学

杜特蒂或许在政治上是该谴责的，但是他的人格特质与矛盾让许多社会学家注意到了。有些人问关于社会历史潮流怎么和个人连结在一起。最近的纽约时报描述杜特蒂是一个在他高中的时候被耶稣会教士性侵而受影响的人，这是杜特蒂在 2016 年的选举中自己说的。该教士后来到了 Los Angeles，又继续性侵其他小朋友，没有人把他移送法办，而他最后在耶稣会的介入下用 1 千 6 百万美元和受害者和解。若是这样的心理创伤塑造了今日的杜特蒂，那整个菲律宾社会岂不是在一个性侵犯的犯罪下受到二度伤害？

以哲学家 John Gray 的话来说，社会学家或许也会问：我们所看到的文明生活如何在转瞬间消失殆尽？特别是在 1986 年的人民力量革命之后，菲律宾就便成了自由民主的招牌。许多人认为推翻了马可仕政府，菲律宾重新肯认了美国殖民时期所内化的价值，也就是个人权利，法制，民主。人民力量革命后的自由民主体制似乎体现了这些价值。但是忽然之间，就在短短一年以内，许多菲律宾人支持了一个主张非法私刑的总统，许多人

愿意为杜特蒂去执行私刑，借用 Daniel Goldhagen 对于纳粹德国的描述，就是“自愿的帮凶”。对某些人而言，看到许多欢呼杜特蒂私刑的支持者是无法解释且悲剧的。而对那些参与其中的其他人而言，菲律宾人似乎不是文明的，不是具有同情心的。或许我们必须用 Goldhagen 所提出去看纳粹德国同样的角度来看菲律宾吧：

这个时期可以用人类学家的批判眼光来看，从一个未知的海岸出发，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可能性保持开放，而为了要解释这个文化的组成、这个文化实践、集体行动与生产的特殊性，这个人类学家要想出一个和自己的常识所不同的、甚至相互违背的解释逻辑出来。这样的解释会承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多数人，即使是出自于善意，是可能、且愿意去杀人的。

> 比较大屠杀

同时，尸体数量持续增加。杜特蒂的反毒战争已经造成成比东南亚近代史的种族屠杀人数更多的死亡人数了。波布的 1970 年代的赤柬大屠杀有 3 百万人死亡，印度尼西亚的 1965 年的苏哈托政权则屠杀了近百万人。最近杜特蒂才对媒体夸口说大概还要杀个 2 到 3 万人才可以把毒品全部清掉。许多观察家则认为即使杜特蒂在开玩笑的时候也要认真对待其言论，所以他说的 2 到 3 万还是低估的数字。■

来信寄给 Walden Bello
<waldenbello@yahoo.com>

> 阿拉伯波斯湾移工的医疗监控

Ayaz Qureshi,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在Peshawar等待要移民的人排队接受医疗检验。Ayaz Qureshi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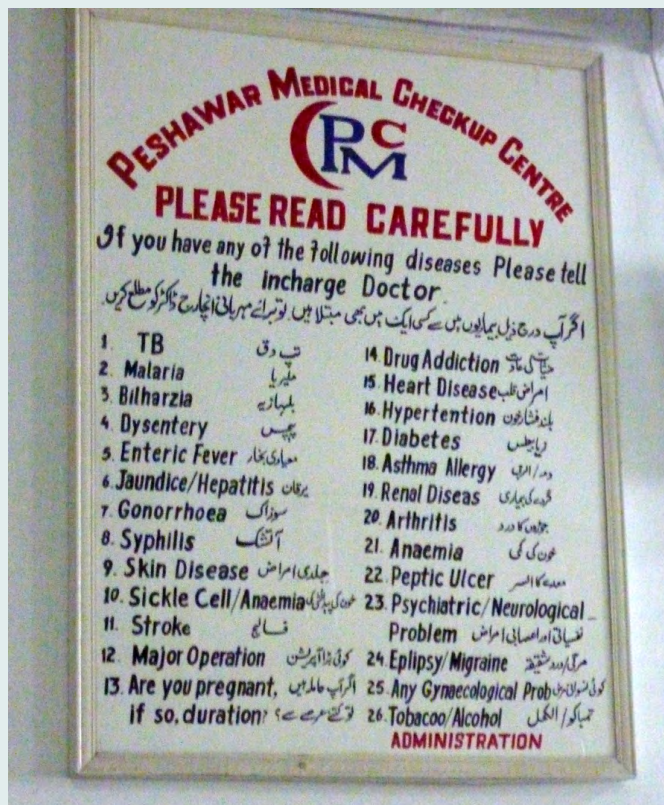
在过去 30 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国家把它们人民送出国外工作，巴基斯坦人民许多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C) 的国家中工作——巴林、科威特、卡达、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王国。但是要获得这些 GCC 国家的签证，移工要在出发前就有健康证明，而且必须只能从 GCC 认可的医疗机构发出。移工因此要去几个大城市通过这些医疗检验。只有那些过去或现在没有任何疾病的人才可以得到健康证明。

GCC 国家对于这种选择健康的移工的方式没有任何的迟疑。巴基斯坦为了和其他邻近国

家竞争——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国家竞争，是不敢有疑问的。虽然巴基斯坦的政府因为那些移工汇款回国的金额而会奖励那些移工，并且描述移工为非正式的外交人员，肩负着穆斯林的道德责任和巴基斯坦的认同，但是那些移工在波湾国家并没有真正受到外交部门的支持，而且波湾国家也对于增加签证感到焦虑。

不规则和有问题的实做的案例层出不穷。许多案例显示了剥削的存在，而也对于监控结果的气馁来自于其他医疗机构的反证，并且国家的退位，让位给私人医疗中心去决定谁“健

>>



在Peshawar给移民做医疗检验的中心。Ayaz Qureshi摄影。

康”或是“不健康”。

中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网络，地区和中心的波湾认证的医疗中心协会负责看管这些相关的利益，透过独占市场，并且透过平均分配而切断竞争，也保障中心工作的员工不会受到遣返，也不会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管制。监控标准则是由GCC国家在沙特阿拉伯的秘书长设置，而相关的实验是设备、空间、人员等都是透过GCC秘书长去控管。

不像其他的医疗监控例子，像是美国的Ellis Island或是Angel Island的例子，巴基斯坦移工的医疗监控是往往更不可见，而且更有侵入性。

害怕无法通过医疗监控过程，有些移工落入了蛇头的控制。有些无法得到证明的移工则往往落入了非法的偷渡管道。

即使得到了健康证明，有些时候必须经过许多回合的检测和花很多钱，这些都是医疗监控，且是移工进入波湾国家的必要程序。任何的工人若是无法完成这些程序就会被遣返。若是被允许进入那些国家，那就要透过这些医疗监控去更新签证。

讽刺的是，流行病学的证据显示移民通常是在移入国家才感染肺结核或是艾滋病的，因为政策规定没有任何染病是更新签证的前提，而检查都是在GCC国家中进行的。例如，以艾滋病为例，通常这是因为移工都在劳动营中居

住，有性需求则只好找上性工作工作者。

任何人若是被检验出艾滋病就会被居留或是遣返，并且也不会告知个人或是政府。有些工人是备用“不预期放假”的方式被解雇，因为放假后就没有再召回了。有些被遣返者甚至没机会去收拾行李，和室友解决纷争或处理事务，也没机会收拾护照等就被遣返了。许多人回到巴基斯坦只有带着一页的紧急护照作为身份证明。有些则要等移民官员去确认巴基斯坦身份，过程可以长达数周，只有等到家人找到当地的代办帮忙才可能走完程序。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对于“健康公民权利”的抗争兴起，人们也要求政府提供健保和挑战那些限制人民权利的医疗。巴基斯坦的移工则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集体行动的可能，而政府则继续和GCC国家合作，继续透过监控健康去剥削移工。■

来信寄给 Ayaz Qureshi

<ayaz.qureshi@lums.edu.pk>

> 经济参与和对女性的暴力

Nida Kirmani,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Karachi的女性的经济活动。Nida Kirmani 摄影。

发展部门和国际金融机构认为增加妇女的劳动参与会增加经济增长和赋权女性，这是一个双赢的情况。此外，人们通常预设在经济上主动的女性比较不会受到性别歧视的暴力。

透过在巴基斯坦 Lyari 的田野研究——那是 Karachi 最历史悠久的工人阶级地带——我的研究检测了那些简化的假设。巴基斯坦的女性只有 22% 的女性从事有给劳动，这是世界上最低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我的

田野场域 Lyari 正好符合巴基斯坦的全国统计平均值，不过，虽然巴基斯坦的多数劳动女性是农业，Lyari 女性则是在都市从事低薪的家务工作，或是在公立及私立学校担任教师。虽然有给劳动参与率很低，但是相较前一个世代是有成长的，只是当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能提供给女性的工作都是低薪、不安全、没保障的。

可是，“经济的能动”并不必然等于“赋权”。如 Naila Kabeer 所说的，市场力

量通常透过不平等的工资和雇用再生产了性别不平等，相似地，当政策制定者常常假设经济参与给予女性可以控制自己收入的权力、财务自主可以让她们远离家暴环境的时候，现实是远比这种假设复杂的。女性的经济参与还是依赖于其工作的本质、家庭的权力关系、以及社群的动态而定。

女性有收入之后可以保障她们远离性别的暴力吗？根据统计，在 39% 和 90% 之间的已婚女性遭受过性别暴力。那我

>>

们不禁想要问：劳动女性更可以抵抗雇主的剥削吗？有工作的女性会得到更多的对于家庭资源与自身收入的控制权吗？

我和 Lyari 女性的访谈结果显示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暴力之间复杂的关系。对一些女性而言，经济自主可以让她们离开或至少让她们会去设想离开其暴力的婚姻，但是领取时薪的女性来说，社会压力仍然存在，特别是考虑到小孩的情况下，这还是让女性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许多女性描述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双重负担，这就是一种暴力。有给劳动有时增加了家庭内的紧张，因为失业的男性都会希望老婆要负起家庭照顾的全责，并且会导致争吵和暴力相向。许多低薪的女性会选择在家，而有些则会埋怨其丈夫无法在经济上负起责任。虽然女性认知到了收入无法带来独立的时候，以及虽然有些人享受在外工作的时光的时候，许多人还是选择避开了双重负担。

对于少数高收入的女性而言，经济上的自主与能动通常被诠释成是个人选择而非必要的，往往是一种个人的实现。但是，这样的诠释不是没有社会和心理上的代价的：婚前的劳动旅性，特别是离家出外有

不错收入的工作的时候，总是会有闲言闲语，会有嘲笑，会有诋毁，这会造成负面的情绪，影响其个人声誉，使得结婚反而相对困难。

在好的方面，研究显示了几世代的变迁。年长的女性多数留在暴力的家庭中，认为受苦是一种美德。年轻的女性则通常不认同婚姻暴力，认为女性应该要更平等，像是回到原生家庭，或是少数独自成立家庭。虽然可以离婚，单许多女性仍然会屈就压力而留在暴力的婚姻中，更多的女性似乎找到了一种在家抵抗的策略。的确，收入是更可以让女性离开暴力婚姻，即使这不必然会发生就是。

总之，我的研究发现了女性的经济参与不保证赋权。虽然经济可以带给女性谈判的筹码，但是是有代价的。巴基斯坦的女性有越来越多人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是工作都是低薪没保障的。要赋权女性，就业市场要有结构性的转变，女性需要高薪和好的工作，而性别权力关系必须改变，让男性也负担家务，且女性的社会流动和自主要被广泛承认。■

来信寄给 Nida Kirmani
<nida.kirmani@lums.edu.pk>

> 移民中的离婚

Kaveri Qureshi,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在英国的巴基斯坦结婚典礼。未婚妻等待未婚夫的到来。Kaveri Qureshi摄影。

—— 十八岁的 Sukaina 是住在 London 的巴基斯坦人。她十八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位在 Lancashire 表哥，然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有 3 个小孩。但是即使生老三之前，婚姻就触礁了。她先生开始当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不定，又长跑外面，后来和一位英国的白人前女友再度搭上线，然后又酗酒，吸毒。她忍耐了 6 个月不告诉父母，因为“他们认为

她的婚姻是完美的，因为有三个孩子，所以高兴得很。所以我想我不能让他们心碎。”所以他又等了两年才离开 Lancashire 的夫家到 London，又等了两年才诉请离婚。

英国的巴基斯坦裔就像许多其他南亚的家庭一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传统家庭文化的堡垒，有最高的结婚率和最低的离婚率。像是 Sukaina 的故事因此很常被规范性的刻板印象

>>

所遮蔽，隐藏。外部人也都这样描述巴基斯坦裔家庭。2007年花了两天在Birmingham与巴基斯坦裔的家庭相处，当时的保守派领导戴维卡麦隆称赞英国的亚裔家庭“不可置信的强韧与祥和”，说“我认为主流英国应该更整合英国亚裔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反过来。”

使用弱势族群四国调查的资料，这是于1990年代中期收集的，量化Richard Berthoud学者发现英国南亚裔的家庭离婚率是4%，比白人的9%的一半还少，甚至比加勒比海黑人的18%的四分之一还少。Berthoud把英国南亚家庭看成是“传统”、“忠诚”于其历史背景的，抵抗个体化的潮流，然而，英国的劳动力调查(2010-2013)则显示今天有10%的英国巴基斯坦穆斯林和印度锡克人是离婚的，孟加拉国穆斯林是8%，印度穆斯林是7%，印度教徒是6%，而白人是20%，加勒比海黑人是27%，混合族群是23%。虽然南亚仍然更少比例回答调查问卷，但是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穆斯林、印度锡克人的离婚率是上升的，接近了更早之前的白人离婚率。那时纪登思就关心英国的分居和离婚社会是一个更广泛的议题。

以民族志研究为基础，于2005-7和2012-14在London和其他地方Peterborough都市所进行的研究，我认为移民的离婚状态增加是从抗拒再婚开始的。我访谈的52位离婚者之中，30位再婚，22位没有，而这22位中只有6个是男性。Sukaina是没再婚的例子，且相当坚持。Sukaina离婚后受忧郁症之苦好几年，但是透过兄弟姊妹的扶持，她继续进修，成为助教，找到工作，不再依赖社会补助。她不再是一位夫家眼中的好媳妇，不顾父母建议的再婚建议。“我一开始很恨男人，真的很恨。我不能忍受看到他们，甚至闻到他们的味道。”Sukaina说。有些离婚者告诉我她们再婚是为了给小还有一个正常的双亲家庭，但是像是Sukaina这样的人来，再婚只是更糟的选择。

若某个女性和男性在离婚后分居，那再婚者是更可能选择自己的另外一半的。67个受访者中，58个是被安排的传统婚姻，而只有9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相反的，49位再婚者中，只有20位是被安排的，9位是半安排的自由恋爱婚，因为其实自由恋爱，但是装饰成是安排的。而有20位是自我安排的恋爱婚。因此，再婚似乎更可能包括了婚前追求和亲密关系的建立。这些自由再婚者也都被家庭更广泛的接受。

Sukaina的经验说明了另外一种倾向：再婚通常是跨种族、族群、阶级、宗教的。几

乎十年来没有另一半的生活使得Sukaina和Sukhwinder谈起了恋爱，Sukhwinder是印度的锡克离婚者，同意改宗为伊斯兰，而且两人的婚姻是由伊斯兰的仪式进行，只有Sukaina的姊妹们和三位男性见证。这样的婚姻听在自由派的眼里好像很棒，但是Sukaina很失望，因为Sukhwinder没有显示任何改宗的严肃倾向，也没有拿下锡克教的头巾。结果Sukaina没有勇气告诉其父母亲这个再婚的决定。

我发现二度婚姻时常并不稳定。30位已婚受访者中有9位的再婚者已经又离婚且要三度结婚，且许多二度或三度婚姻的受访者常常是充满冲突的，这让我们认识到了婚姻社会学是对再婚认识不多的。我们需要不仅仅是关于离婚，还要非正式关系和再婚的研究。也需要关于婚姻规范如何随着迁移、跨国、移民而变化，而这些倾向被看成是把“留下”的文化看成是铁板一块。我的研究指出了，这在过去并非如此，现在也不是。■

来信寄给 Kaveri Qureshi
<kaveri.qureshi@lums.edu.pk>

> 恐伊斯兰症与英国的反恐安全政策

Tania Saeed,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Arbu绘图。

英国的教育机构愈来愈配合政府的反恐安全政策。在所谓的反恐安全法案(CTSA)之下,教育机构有“规范义务”要通报那有风险会激进化的学生。而激进化的指标是很难去定义的。清楚的是那些“社会性脆弱”的学生很有可能是穆斯林。更有问题的是,非暴力的极端思想也有可能被怀疑,只要是和“英国价值”违背的都会。结果就是那些想法会消音,而不是被挑战或是辩论。

2015年的反恐法案是在2005年7月7日的伦敦爆炸所订定的。其他反恐安全政策也都锁定教育机构。穆斯林学生很常被怀疑。

按照英国政府的报告,防治策略(2011)的安全人员已开始和教育机构去合作监视学生。有些案例,像是伦敦大学的校友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试图攻击飞往美国的班机。另外一个前学生Roshonara Choudhry则砍刺英国政治人物为伊拉克人民报复。年轻学生加入ISIS则让人更对于穆斯林学生感到困惑。但是新的法案让大学监控成为法律责任。这样的政策不和穆斯林学生互动反而会异化穆斯林学生,讽刺地开启了一种更不安全的氛围。虽然男性穆斯林被认为比较有立即威胁,穆斯林女性则被看成不是受害就是激进,躲在面纱之后。

在2010和2012年之间执行的一样研究分析了40位年轻英国穆斯林女性学生和校友的叙事,探讨其恐伊斯兰症和英国反恐安全措施的经验。这个研究在巴基斯坦被高度怀疑的时候进行的,包括了那些巴基斯坦的二代英国移民以及巴基斯坦的留学生。女性穆斯林则涵盖了不同的“宗教性”,从面纱(niqab),头巾(hijab),长罩(jibab),传统巴基斯坦服侍(kameez)和裤子(shalwar),还有没有任何外貌打扮的穆斯林。该研究聚焦在伊斯兰学生组织(ISocs)的经验,该组织被批评为无法遏止校园的激进化。福利官员,学生代表,伊斯兰学生组织的干部也都接受访谈。

女性的经验主要是服装上面为主。不令人惊讶的,niqab最受到目光的注意,年轻女性有被大叫是极端主义或是宾拉登的妻子的经验,面罩变成是一种外来宗教认同的符号。也有受访者说有被种族主义的话语操扰,特别是用“雷思边”攻击那些niqab或是hijab的穆斯林。这也反应了异性恋的恐伊斯兰文化。相较之下,没有特别宗教认同的穆斯林女性则感觉不够穆斯林,因为没有人注意她们。巴基斯坦的外貌挑起了文化上被压迫的刻板印象,未受过教育的女性则是支持杀戮和逼婚的文化的牺牲者。

和这样经验奋战的学生是包括了校园或校外的都有,但是ISocs的成员别会被挑出来。男性和女性的成员通常要防卫自己,那并只

>>

是因为对抗校方对他们的举办活动怀疑，还是因为要对抗自己宣称的“温和”穆斯林身份认同。受访者描述“温和”穆斯林如何避免了 ISoc 的活动，因为害怕会变贴标签，而 ISoc 的学生则被称恐怖分子，认为有可能被情报单位监视或是间谍渗透。许多受访者也说到害怕被贴标签会导致自我的言论审查，也因为怕被说几近而避免某些政治活动。

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网络也显示了另外一种脆弱，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变成“高度安全化的”，因为巴基斯坦认同被怀疑，由于有“反恐战争”正在巴基斯坦开打。有些学生或许避免掉了一些和巴基斯坦有关的政治，但还是会卷入有关阿拉伯之春或是巴勒斯坦的议题。其他则说有时会掩盖自己的真正认同，这特别在 2005 年 7 月 7 号后是如此。

这些研究发现显示了不同的穆斯林社群可能经验到的安全论述是不一样的，不只是因为宗教性，也因为不同的族群和民族认同。美国总统川普的 2017 年穆斯林禁令针对了某些穆斯林国家，像是叙利亚等国，这也让不同认同的穆斯林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脉络下有不同的反应。

若是宗教性的程度导致了怀疑的歧视的程度，研究也显示了年轻学生积极的去反抗那些刻板印象。透过“认识伊斯兰周”的活动，或是简单的挑战对伊斯兰的先入为主的认识，穆斯林的学生试图要改变公众态度。当有些学生拒绝宣称“正常”或是清白这样的心理负担的时候，人们不能不看到那些穆斯林或是非穆斯林的学生是如何反抗那些政府的安全政策。

许多大学知道要尽到“妥善照顾”学生的责任，也就是确保“言论自由”和“规范义务”，要通报有“风险”会激进化的学生。然而，这样的“照顾责任”时常有所妥协，就像在 Mohammad Umar Farooq 的例子一样，他是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的学生，他被学校通报说在阅读恐怖主义研究的教科书。Rizwaan Sabir 被通报去下载盖达组织的手册（在书店已经可以买得到了），但是他是在做研究，其他还有许多被错误通报的例子。

大学将会继续被纳入英国的反恐安全计划，就像英格兰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所要实施的 2015 年的反恐安全法案规范义务。穆斯林学生的受访者表达他们若是不被时时监控的话，是愿意和执法人员接触的。他们也认识到了虽然许多年轻英国穆斯林拒绝 ISIS 这类组织，但是问题还是很重要的。的确，许多受访者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然而，让所有的穆斯林都成为可疑对象，强加一种不安全的文化且让争议性的观点被闪避掉，这样一来大学开启了一种让穆斯林学生成为恐伊斯兰症的歧视对象，所以大学是没有尽到对伊斯兰学生的“照顾责任”的，且有可能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来信寄给 Tania Saeed

<tania.saeed@lums.edu.pk>

> 基础建设的政治

Amen Jaffer,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垃圾收集者正在找可回收物，并且在Ozpak厂商来之前要找到。Khurram Siddiqi摄影。

自从20世纪的最后10年，巴基斯坦的经济已经被私有化和去管制化所转变了，这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并且由不同政党组成的政府和军人专制所支持的。然而尽管政治精英对此有着高度的共识，执政的巴基斯坦穆斯林纳瓦兹联盟 (PML-N) 和其他政府不一样的是，它们聚焦在基础建设上面。从1990年代开始，PML-N政府已经建立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策略，围绕在“发展”基础建设上面，包括最近的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 (CPEC)，这被政府赞许为“革命性的政策”，将会彻底拉起巴基斯坦的经济。

巴基斯坦政府承诺这些道路、铁路、能源的基础建设计划——主要是跟中国政府贷款然后由中国的公司执行——将会带来国外和国内的巨额投资，创造工作机会给巴基斯坦人民。

但是这个经济策略是奠基在这样的假设上面：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支出将会刺激经济发展。尽管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设，像是在PML-N政府于1990年建造的Lahore-Islamabad道路就是如此，甚至还有许多国外的案例说明了大型基础建设只是上外国投资厂商获利。在一个有着不健全公共服务的国家，教育和健康

都是全球最糟糕的地方，这种大型基础建设根本是忽视人民的基本需要。虽然称之为基础建设，那些建设都是盖给大公司的，忽略且让非正式部门受害，而这些是多数巴基斯坦人民的工作所在，结果只是恶化的经济不平等。

以Lahore的固态污染排放物管理为例。2010年，Punjab政府私有化了污染排放物的收集、运输、弃置，并成立了Lahore固态污染排放物管理公司 (LWMC)。这是一个上市公司。这间公司委外经营，给了两间土耳其跨国公司经营：Ozpak和Albayrak，每吨垃圾付给20美元去把它们丢弃到LWMC的处理场。而道路建设和扩建让Ozpak和Albayrak占了许多便宜，因为这些基础建设让两家公司的污染排放物运输得以更有效率。

Ozpak其中的处理中心之一位于Lahore Ring道路 (LRR) 附近，一个新的六线道。各处收集而来的垃圾会由卡车运到该中心，那些卡车都是大型的，装备有举重和压缩垃圾的设施，而小型的道路则给比较小的卡车使用。一旦垃圾被运到Ozpak的处理中心时，机械卸除机器会把垃圾分大型的垃圾车上，然后运送到LWMC位于Lakhodar的垃圾场。很清楚的可



垃圾收集的聚集地，在此分类从都市收集来的垃圾。Khurram Siddiqi摄影。

技虽然有效，有卡车和先进技术，但是私有化整个工业的结果是牺牲了社会底层的阶级。

污染排放物管理工业只是多数导致巴基斯坦不平等更加恶化例子之一，经济边缘弱势群体在这个转型过程之中并没有发声的机会。然而，我们还是有乐观的理由，有些低收入小区把基础建设转化成公民身份的核心支柱，去要求在贫穷地区可以改善基础设施。这样一来，长期让私有化产业在公共建设中获利的情景或可改观。■

来信寄给 Amen Jaffer

<amen.jaffer@lums.edu.pk>

以看到 LPR 是整个运作过程的枢纽，让 Ozpak 的作业节省了许多燃料、时间、人力成本。

Ozpak 的复杂科技作业和“非正式”的垃圾收集与处理是大相径庭的。一般的垃圾回收是透过人力、骡子、推车、脚踏车、摩拖车等方式，有些则是用挨家挨户收取少量月费去收集垃圾的，然用人工去分类瓶罐、纸张、厚纸板、塑料、金属等垃圾。这些回收物被卖给小型的回收厂商，然后再卖给那些中型垃圾处理场。

然而，虽然这些厂商是回收工业的主干，但是这些工作都是在危险的环境下进行的，回收工人是在这个经济的底层，工资很低，并且受到刻板印象和歧视的对待。不惊讶的，许多工人都是 Lahore 社会的最底层的一群。

更有甚者，基础建设的扩张直接或间接的让垃圾回收工人的经济更加恶化。Lahore Ring 道路的建立就让这些工人受到了影响。第一，他们的运输模式：骡子推车和脚踏车等，都不能上该道路 (LRR)，要让那些人去挤那些很小的道路。第二，他们的工作需要时常穿越 LRR，这增加了他们的时间与距离，因为可以穿越 LPR 的地方都相隔很远，或是逼迫他们为了省时省力只好要在不能穿越的地方去穿越，来来往往、高速行驶的车辆相当危险。所以，LRR 的建造只是让这些工人的工作负担加重而已。

间接地说，LRR 则让大垃圾公司得利，而大垃圾公司是和小型业者的利益相互冲突的。在一些小区之中，有些家户开始停止付钱给垃圾回收工人。此外，大型公司的垃圾处理方式让回收工人更难生存，公司把工人的传统方式视为是阻碍。

因此，Lahore 基础建设发展肥了大公司，瘦了传统回收工人。所谓的污染排放物管理科

> Zygmunt Bauman 的道德视野



| Zygmunt Bauman.

波兰社会学家 Zygmunt Bauman 于 91 岁过世，为其传奇重要的一生划下句点。要总结其一生是很困难的，但是如 Keith Tester 所说的，“Zygmunt Bauman 这样的学者是找不到第二个了，因为他是中欧和东欧知识分子世代的一员，经历了 20 世纪的灾难，这些灾难是许多学者的研究主题，但是他却是亲身经历过。”

Bauman 于 1925 年在波兰的 Poznan 出生于犹太家庭，后来全家在 1939 年

被迫逃亡到苏联躲避纳粹迫害。4 年之后，他加入了苏联的波兰军队，他虽然受伤，但是还是在 1945 年回到了柏林的战场上。

而在战后的波兰，Bauman 升迁很快，变成了队长和政治官员。这个时期的 Bauman 是个理想的共产党员。但是他对于共产党的信仰在 1950 年代早期瓦解了，因为他在反犹太的迫害中被军队解职了。后来他马上转向学术，并在 1954 年成为华沙大学的社会科学讲师。他是成功的社会学家，探讨了相当多的议题。60 年代他成为了社会学系主任。

然而，Bauman 似乎被政府视为改革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他质疑国社会主义，有一篇文章批评计划的局限性。他的立场很不确定，并且在 1968 年的另一场反犹迫害中，他和其他五位教授被解雇了，后来他和家人离开波兰，后来在以色列，澳洲，加拿大等地兼职，后来在英国定下来。1971 年之后，他是 Leeds 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直到退休。

此后，Bauman 在英国社会学相当为人所知。其对于欧洲数种语言的了解以及对于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掌握，使他对于当代理论相当擅长，所以 1980 年代就成为了“后现代性”的重要人物。然而，Bauman 很快地了解到被归类为后来成为去政治化和保守的这个知识架构的危险。

为了保持对于社会秩序的批判，Bauman 展开了对于“液态现代性”的探讨。《液态现代性》(2000) 一书出版之后，他研究了市场化和个体化的影响如何镶嵌在新自由主义计划之中，并且对于这带来的苦难与伤害有着很高的敏锐度。

Bauman 晚期作品的核心关怀是现代性。而

最主要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是《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这本书获得了 Amalfi 奖。此书着重在邪恶的能力如何在现代性计划中作为基础，透过“理性化”的组织技术穿透社会。此后，其作品都围绕在道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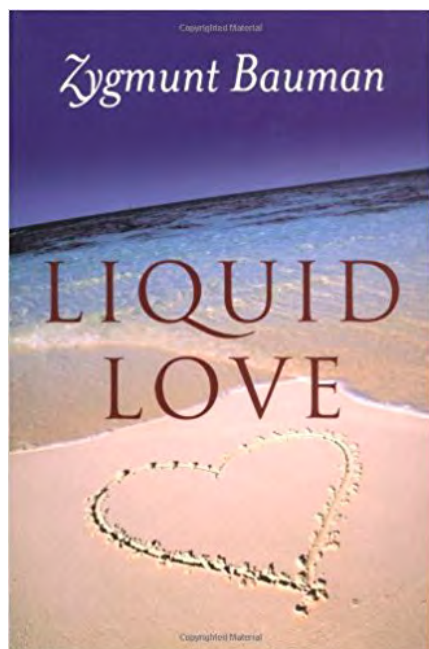
在 1993 年出版了《后现代伦理学》之后，Bauman 在伦理社会学领域变得相当有影响力。他对于传统社会学对于道德的解释是质疑的，被且被 20 世纪发生的惨剧所启发——他也亲眼目睹了——所以 Bauman 和哲学与神学家 Emmanuel Levinas 的作品有着很深的对话。这也让他发展了所谓的道德现象学，道德行动是基本的行动，先于社会化而存在。

Bauman 对于伦理的研究相当的有争议性，因为其通常被认为视对于社会学家的挑战。但是 Bauman 的社会学的（而非哲学的）对于制度的权力和企图对于人类知道德能力的限制，式非常精辟和重要的。其著作将会继续被那些希望社会学不仅仅是管理科学的社会学家所阅读。■

Peter McMylo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英国

> Zygmunt Bauman

怀疑的乌托邦



Zygmunt Bauman 的自传可以相当轻易地被整合到波兰知识分子阶层的 20 世纪的故事之中：在历经了可怕的战争之后，迷上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整个世代的知识分子都试图要去修补实存的社会主义，不过在发现共产党的独裁本质后，都幻灭了。后来，知识分子也参与了 1989 年的共产党瓦解的历史。最后取得胜利，然后教导人们如何行使得来不易的自由权利。

不过还好 Bauman 的故事不是这样的。虽然他沈浸在这大历史之中，他从来没有顺从历史的洪流。他对历史脉络的脉络相当敏锐，并且也知道保持自己的自主性。

Bauman 的观点可以被定义为怀疑乌托邦主义：Bauman 透过分析社会秩序去揭露乌托邦的元素如何维持的宰制的结构，但是他也要求乌托邦去强化其批判，并且诉求社会变

迁。其观点的根源于 Bauman 自己的波兰战后的个人经验之中的。

> 斯大林主义，异质的经验

至少在波兰，战后知识分子阶级对于斯大林主义的信念的主流论述可以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Czesław Miłosz 的《Captive Mind》一书中看到。这本书呈现了波兰受教育阶层如何缺乏宗教信仰和被虚无主义所害。而共产主义填补了知识分子们的这部份的心灵空白，因为共产主义提供了一种整权的世界观，并且给予了知识分子重建世界的希望。马克思主义有足够的复杂度去吸引那些知识分子，并提供政治权力和人民的亲近性。Miłosz 描述了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种半宗教意识形态的崇拜与迷恋，因此解释了为什么年轻的知识怎会那样的热情投身到新的社会主义系统之中。

这样的故事部份和新的文化精英经验深深投入斯大林主义之中是吻合的，但是这没办法用来解释所有的例子。对我们来说，Julian Hochfeld 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是年轻 Bauman 的榜样，也是华沙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圈的领袖，这个学派还包括了 Jerzy Wiatr, Maria Hirsztowicz, Włodzimierz Wesołowski, Aleksandra Jasińska-Kania。

在 1950 年代开始，Hochfeld 诉求要把社会学从大学中拿掉，因为那是布尔乔亚精英的科学，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容身之处的。Hochfeld 不必

然符合 Miłosz 的描述，因为他是一位战前的科学家和运动分子，隶属于波兰社会主义党 (PPS)，其在战后希望可以运作一个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当斯大林决定要铲除所有的政党时，Hochfeld 促使 PSS 要去加入波兰共产党，后来在 1948 年成为了波兰共产党人联合党。Hochfeld 对于斯大林主义的信仰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看到日渐缩水的政治空间下所做出的策略性选择。他希望可以继续其政治活动，但是这个希望没能实现。尽管始党员也是议员，他很快被边缘化了，因为他持续批判共产党和斯大林。Hochfeld 呼吁要分析社会主义下的异化，并且试图去分析议会如何和民主集权主义互补，所以他成立的一个期刊：Socio-Political Studies。

Bauman 看到其导师这样的经验，是有被影响的。虽然 Bauman 是站在冷战的社会主义阵营这边、反对资本主义的，其写作却是有些相反。Hochfeld 的例子让 Bauman 在两条战线作战。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社会学家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并且也拒绝社会主义的形式。

> 对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

在 Bauman 于 1968 年之后的作品里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被当作工业化社会。这代表了大量的生产，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科层化组织。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能被理解成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

Bauman 的作品于这个期间是企图要融合西方社会学的科学传统到波兰文化之中的，目的是要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这个社会是和资本主义不同的，无论在所有权的组织上，阶层建立的机制上，以及现代化的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中，这些是发生在资本家的独裁之中的，而不是共产党的计划。而铁幕的两端都历经了权立的腐败，劳动的异化，个体和集体之间连结的消失。因此，Bauman 在他的 1964 年的《Sociology in Everyday Life》（后来称为“社会学动脑”）书中论证社会学应该批判地看待这些过程，不只对决策者对话，也像一般民众对话。

Bauman 的路径是有风险的，在 1965 年，他站在被镇压的学生那边，加入 Kuron 和 Modzelewski 写的《The Open Letter to the Party》的阵营，那是一个改革派。Bauman 被视为党的眼中钉，并且因为因为反犹太主义的兴起而被整肃。像是其他犹太人，Bauman 被迫流亡。

＞ 社会学家的乌托邦角色

Bauman 离开波兰标示了他长期沉默的开始。这和他之前对于反犹太主义的发声很不一样。之后他的第一本书，《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定义了 Bauman 后来的研究和一位批判的社会学家。不像许多其他的波兰知识分子，像是 Leszek Kołakowski，Bauman 并不拒绝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想象而支持去反对极权主义。同时，对个体的注重也是现代消费社会和诉求社会变迁的运动特征，并且造成了两种宰制：核心和边缘之间，以及国家之内的全球不平等。

Bauman 接下来的活动可以被看成是《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一书的延续。

这本被广泛阅读的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书揭露了对于乌托邦的怀疑。其认为，对于可以开创一个可预测和透明社会的这样的信念，其实是暴力的根源，也被国家所组织去对付那些不适合于这个社会的人。在当代的后现代乌托邦社会中，这样危险观点是被禁止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乌托邦的负面影响，包括了相信个体有能力去完全自由创造自己，在市场上选择。Bauman 在《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一书之中描述了这样的乌托邦承诺的吸引力，但也讨论了其风险，包括了寻求完全真实的认同、对于专家的依赖，以及把个体简化成市场元素的危险。

除了共产社会下的负面后果之外，Bauman 也指出了那些被这个系统排除的人。那些仍然被忽略的人一直被排除在社会之外。那些穷人，无家可归，移民，难民等等，Bauman 称之为被浪费掉的生命。批判的目的是让那些人被看见，提醒人们那些人是需要帮助、保护、尊重的。把我们和他们连结在一起的不是物质利益或是政治利益，而是伦理。这是奠基在人性之上的。

Bauman 定义其工作是乌托邦梦想的诠释者，并且和东欧知识分子阶层做出区隔，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教导者。Bauman 说明了，虽然社会学家应该理解社会生活的动态，但是也要站在社会边缘的那边，因为那边是被剥夺掉人性的。

Maciej Gdula,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兰

> 怀念 Zygmunt Bauman



Zygmunt Bauman和Peter Beiharz。Sian Supski摄影。

当 皇帝驾崩，有人哀吊，也有人忌妒。这是政权过度时期吗？而 Bauman 是皇帝吗？当然不是。他是晚期成名的学者，不情愿的名人，对昙花一现不报期待的人。就像他说的，理解是不可能一蹴可几的。他重要但非主流。他同时是局内也是局外人。

Bauman 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是关于英国的劳工运动，在 1972 年出版。他因为这样被 Edward Thompson 边缘化，并且持续了好几年。他被同事忽略，然后只好引用自己的文章，开创自己的社会学，透过隐喻去分析社会。

可是 Bauman 在世界上却被广泛阅读，读者来自各地，而且接受到他深深的影响。或许这就是忌妒的源头吧。Bauman 从脚注中走出，成为议题。他不再为可能阅读他的同行们写作，而为赌徒、为日常生活的通勤者写作。他是生活的资料，也是二十世纪经验的素材。他鼓励我们去把世界的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去问问题，而不是替那些拥有问题的人解答，包括贫穷、流动、受苦，甚至爱、失去、忠诚。

或许我应该讲个故事。因为，若 Bauman 不是个说故事的人，那他应定是个对话者。25 年

>>

来，我每年到 Leeds 造访 Bauman。上次见到他是 2015 年，那时是他 90 岁生日，我那时在南非的 Stellenbosch 工作，而那时他出现在南非，就像个老间谍，在我们到 Cape Town 之前出现。然后飞到 Manchester，然后做火车经过 Pennines 到 Leeds。（我很怀念上次生日，那时我们在成都，那时我们去谈 Bauman 家庭，他和老婆 Janina。中国人也对 Bauman 很感兴趣。）

出发到中国之前，我在写一篇关于 Bauman 的文章，是要发表到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的。Bauman 吸引我的地方是，30 年来，我从来没有对他失去兴趣。当我从 Stellenbosch 的图书馆借来《立法者与诠释者》时，我发现每页都充满的注释，这让我很享受。然后我接触到了《液态现代性》。第三章是“时间 / 空间”。这章从 Bauman 到南非开始，事实上是 Somerset West，就在我工作的附近。而主题呢？门禁小区，这后来成为了一种艺形式。而他的研究计划对象：Heritage Park 仍然未完成，就在 N2 高速公路旁，从 Lwandle 开始，那是一个黑人的历史光荣小区。主人与奴隶、观光客和浪人，Bauman 的目光从 Leeds 到了南非。

他皱眉，淘气的问：我有从图书馆偷过该书吗？我说没有，我只有借过。于是我们一起在 Lawnswood 花园检视那本书。这是一条从 Somerset West 而来的漫长道路，然而或许也不是。现代性和其黑暗的一面一起旅行呢。

我很荣幸有机会成为 Bauman 的诠释者。像他说的，我们工作是去把他混乱的研究中找到秩序。他是个有力的作者，有 58 本英文著作，这是个丰富的遗产，是这个液态现代下的问题的丰富诠释。

所以这会是我想对新进人员的忠告，就是把 Bauman 任何书中的议题拿来，然后看看会怎么衍生。或许像是 Simmel，他是个社会学印象派，是生活碎片的分析家。但是他总是随着马克思，所以他的兴趣可以称之为是座落在文化与关系

中，不对称的生产、分配关系。然后，像是葛兰西一样，他放弃认为我们可作得更好。

现在结束了，那他会怎么总结自己的作品？就我的经验来说，我好几次尝试要去概括他的作品：批判现代性的过多性，剩余人口的社会学，另类现代性的理论，包括纳粹德国，或浪费的社会学。更传统的说法，或许可以称没有虚幻的现代性批判，东欧批判理论，而且东方在这里有点重要。或是韦伯马克思主义者。这里还有其他的，像是分类理性的批判。最近的作品或许可以被称之为时间的诊断，时间象征的批判，一系列从希望精神中发出的警告。

他是个例子吗？当然。但是他不是个领导者。他的例子清楚说明了我们都应该走自己的路，这是唯一让批判社会学继续下去的一条路。

Peter Beilharz, Curtin University, 澳洲

> 非社会学时代的社会学

Howard Ramos, 加拿大社会学会长, Dalhousie University; Rima Wilkes, 加拿大社会学候任会长,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Neil McLaughlin, McMaster University, 加拿大



| Ariane Hanemaayer摄影。

23

世界在过去几年来，本土主义兴起，排外主义抬头，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世界充满了后事实、假新闻、假报导，把社会问题归因给个人。简化、原始、个人主义的社会问题归因大行其道，深深影响了社会文化。

渐渐地，社会学的取径被世界上的领导人所屏弃。法国总理 Manuel Valls 就是个例子，当被问到关于对于原住民女性的暴力与恐怖对待时，他说社会学是一种“找借口的文化”。社会学看起来似乎是个不入流的学科。

许多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还有学术圈外

的人，都没有办法看到社会学的用处。越来越多人饼器用社会学的方式去理解暴力的源头与社会根源，或是去平衡造成难民、贫穷、不平等的环境，因为那被认为是允许暴力与极端主义。这样的看法让亚洲和拉美的系所关门，也意味着社会学是次于其他社会科学，像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

我们相信社会学在接下来的几年是重要的。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是需要用更广泛的结构和历史角度去分析的，社会学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但是要能有效达成这个目标的话，整个学

>>

科必须去随着时代而改变。社会学家要更多元，这不只是人的部份要如此，还包括理论、想法、实践、应用的多元。许多圈外人认为社会学太过道德倾向，只提供了会吸引左派的社会问题解答。

我们将会从其他学科的视角获得帮助，也会由于对保守的声音开放，并接纳实验和新潮的尖端方法，像是非母数统计模型，机器学习，适应系统模型，视觉分析，诠释质化分析等。这样一来这个学科会吸引新的观众。

社会学家也需要和更广大的公众去互动，包括那些不同意社会学论点的人。社会学家通常被认为用学术术语黑话，像是“社会建构”，让论证变得无法反驳。为了避免被贴上精英的标签，被疏远，我们要转译我们的知识成日常生活的语言，吸引那些学术圈外的人。

社会学介入的机会也是很重要的，并且要快。社会家要珍惜那些已经造成的改变，聚焦在新浮现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困在这个学科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上面——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理论。若要处理婴儿潮的经验，那就必须如此。

我们必须去处理那些长期以来的社会议题，像是阶级不平等，或是和原住民的和解，去殖民化等，此外还有气候变迁，人工智能的兴起，性别规范与期待的改变，以及寡头统治的复辟。

在这期的《全球对话》中，加拿大社会学

家Daniel Béland, Fuyuki Kurasawa, Patricia Landolt, Cheryl Teelucksingh 和 Karen Foster 展现了社会学如何可以贡献给公共政策和知识动员，以及对于各种不平等、公民身份、环境等的分析。即使在非社会学的时代，社会学还是可以引领知识界。

我们对我们的知识限制抱持谦卑的态度，尊敬那些我们不同意的声音，也对我们研究结论可能带来的惊讶保持开放的态度，社会学如此一来可以形成一种社会知识，让人可以在社会中顺利行动，也帮助发展出各种社会问题的永续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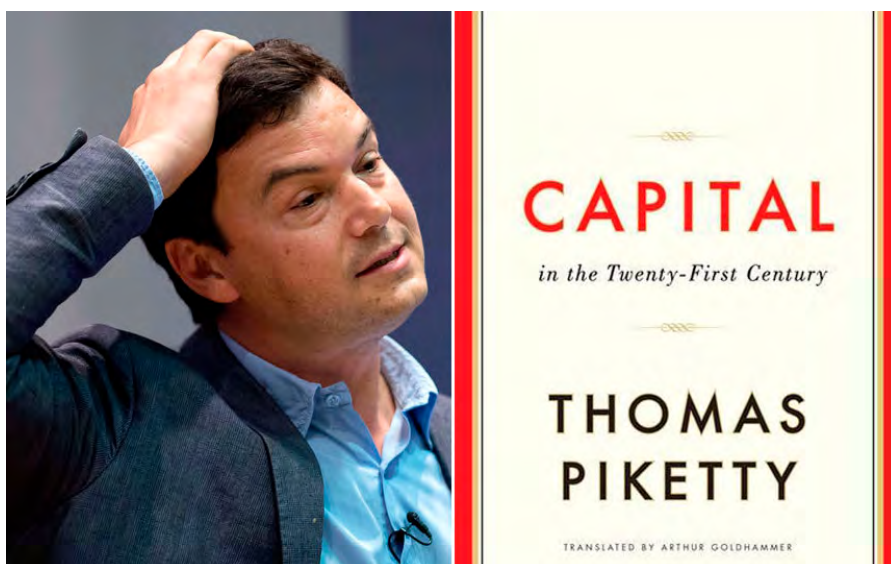
来信寄给 Howard Ramos <howard.amos@dal.ca>

Rima Wilkes <wilkesr@mail.ubc.ca>

Neil McLaughlin <ngmclaughlin@gmail.com>

> 贡献社会学于 公共政策

Daniel Béland, Johnson Shoyam政策研究所, 加拿大, ISA贫穷、社会福利、公共政策研究委员会 (RC19) 会长



Thomas Piketty, 研究不平等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正在偷走社会学的牛肉吗?

世界上多数的国家中的政策领域中，社会学比经济学还要不被重视。这在加拿大总理 Stephen Harper 的轻视反对“社会学投入”中清楚可以看到。作为一位在加拿大政策圈中的社会学家，我每天和经济学家互动，也引用他们的文章。经济学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可以用复杂的理论和方法去讨论具体的政策问题。

但是这个对于政策建议的重视是主流经济学的强项。经济学是有盲点的。关键是其会排挤社会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让跨学科的政策对话更加复杂。

仍然的是，若是社会学家希望进入政策场域，若想要影响政策辩论，若想要让社会学更相关，那就必须效法经济学。社会学要去指出政策的影响，并且想想怎么去传播给政策制定

者。

这项任务特别重要，因为经济学家正在入侵那些社会学家曾经擅长的领域。尽管有例外（加拿大 John Myles 的社会政策研究和 Gérard Bouchard 和 Victor Satzewich 的移民政策），社会学家并不被看成特别对政策建议有帮助。甚至在不平等这个社会学主导的领域也是如此。之前许多主流（i.e., 非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并不关心不平等，因为那和新古典的模型不吻合。但是最近经济学家开始去看不平等，提供清楚的政策建议。Thomas Piketty 的《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3) 已经受到政策圈广泛的注意。因为这是被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以及政策界长期被经济学所主导，Piketty 的论述比社会学家还要受到关注许多。

尽管或许由于这些原因，社会学必须额外努力去接触政策游说者和推动者，以及决策者。社会学通常是提供批判和历史的角度的不平等的（讨论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和演变），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声音被听见是非常重要的。更广泛来说，应用的政策研究应该被重视，特别是若是社会学家想要改变世界的话。

若我们学习如何用具体政策草案和立法者打交道，他们会看到社会学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社会学家应该和经济学家一起交流去提供实践的解决办法。这表示研究不平等的社会学家应该仔细想想政策的脉络（如加拿大给予老人的保障收入补助以及联邦的平等化系统），考虑财政和实践的议题，这些事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看得比较仔细的。

第二传统上社会学家已经做很久久的领域就是规范和认同的形成。而经济学家现在正在加入。虽然 Piketty 或许是经济学中不平等的新面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eorge Akerlof 和 Rachel Kranton 是支持其称之为的《认同经济学》的 (2010)。认同经济学聚焦在文化规范上面（关于像是性别关系或是小孩老人的对待），以及这些如何影响人类行为，这都和社会学非常相关。

虽然这和 Piketty 的学院之外的研究的知名度来说是不上的，不过认同经济学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因为规范和认同甚至比不平等还要在历史上被主流经济学家忽略得更多。从跨学科的观点来说，好消息是至少有经济学家研究规范和认同，这可能会迈向跨领域的对话。Akerlof 和 Kranton 的研究可以让社会学家知道学术研究如何可以对于政策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例如，研究年轻人怎么看待自己和成年人的关系可以帮助改善教育取得或是形成更有效的反吸烟政策。社会学家或许过去已经提出类似的方案了，但是认同经济学提醒了我们社会规范和认同是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实践上应该鼓励更多的社会学家去从经验研究为基础推动政策。

这些例子说明了主流经济学家终于比较仔

细的去观看重要的社会现象了，但是这些议题社会学家早就研究很久了。这些新的跨学科的机会也代表了对于政策社会学家的挑战：这些社会学家及其他领域的同事必须要在游戏中更进一步去推动政策。他们必须使用传统和网络媒体去接触更多的一般民众，运动者，决策者，去确定“社会学的投入”是政策辩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不是政治人物可以说丢就丢的。■

来信寄给 Daniel Béland

<daniel.beland@usask.ca>

> 加拿大暴露在危险下的非公民身份

Patricia Landolt, 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 ISA 迁徙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委员(RC31)

社会学仍然是公共领域辩论的重要声音，因为社会学挑战常识对于社会议题的理解。例如，考虑迁徙和移民的例子，在加拿大以及其他迁占国家，移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永久的移动，而目标是增加国家的人口数量。然而迁徙社会学指出，暂时的移民却变多了，而且政策也让迁移导向了危险的非公民身份。社会学的视野提供了反霸权对于现在移民系统的解释，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全球来说，法律地位和公民身份是流动和幸福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这也造成了不平等。最近几年，许多国家因应移民的增多而开创了新的法律范畴，制度化了非移民身份的轨迹，让移民花许多年的时间在不确定法律地位下，也让移民迈向非法化。

虽然法律之外居留和遣返移民的系统越来越多，公民身份的取得越来越严格，虽然每个国家不一样，但是加拿大来说，在暂时与永久移民之间的变化关系已经造成了危险非移民身份的兴起，这在劳动市场和工作经验中可以看到。

危险的非移民身份指的是暂时或是有限的法律地位，以及差别化的融入经验。危险法律地位指的是一个人只有暂时的法律权利在一个国家停留，而且没有任何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危险非移民是会被遣返的，而国家可以强制居留或遣返危险非公民。

危险公民在法律限制使用资源的强况下居住、工作、学习、养家。加拿大的非公民包括了所有的移工、国际学生、难民、特殊签证、以及任何没有地位的人。2010 年有 120 万到 170 万的非公民生活或工作于加拿大，而加拿大的人口只有 3 千 4 百万。

在加拿大，在希望移民带来长期人口成长和希望移民只是暂时劳动的补充两种观点之间总是有着紧张关系。历史上，长期目标和短期

目标之间的平衡是透过两轨制的移民体系而得以可能。一轨是让临时移工只能在限制下的地点工作，限制使否可以带家人来，限制居留时间。这个类别的移民包括了 1880 年代来建筑铁路的中国移工，1950 年代的加勒比海女性家庭帮佣，以及 1970 年代的墨西哥农业移工。第二个轨道则透过联邦记点体系提供永久公民身份，已教育、官方语言、家庭链接等为基础。到了 1990 年代，这两个方式是在组织和论述上分开的。第一个方式带来非公民，且绝大部分是看不见的，而第二个方式则带来移民贡献给国家建造，且常被人们所庆祝。

2000 年代联邦的移民政策抛弃了这个两轨制。第一，选择技术移工的标准被限缩到那些有比较多财产、高教育、官方语言说得好的。第二，难民、亲属移民的资格也被限缩许多。第三，移工的技术要求则降低了。最后，新的机制被设计出来去把暂时移民转换成永久居民。雇主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媒介。简单说，取得永久移民的管道缩小了。暂时移民远多过永久居民。

暂时移民和永久移民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加拿大的劳动市场，因为危险非公民的工人是新的景象。1990 年代之前，暂时移工集中在农业，都市、高技术产业、家庭照顾等，但是这已经变了。2011 年之前，暂时移工在每个省都有，都市和乡村皆是，这也造成职业分散和下降。2005 年的前五大移工职业是高新技术和创意产业。2008 年的前面排名产业是低阶的食品制造业和建筑业。

危险的非公民和工人有不同的权利，和国家雇主的关系也有差别，但是我们对于介于两者之间的身份理解甚少。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可遣返的非公民工人对所有的工人都是有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数据显示对于劳动标准和工作条件都会有损害。

“危险的非公民身份正在进入加拿大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

危险非公民身份改变了工人、雇主、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改变了公民和非公民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来说，可遣返性限制了非公民工作者的劳动市场权利。当然，这在公民和可遣返的非公民工人之间的差异在 100 年前也是如此。过去和现在的差异在于这个危险的非公民身份，包括了数量上以及双轨制的移民体系，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危险非公民被整合到加拿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

来信寄给 Patricia Landolt
<landolt@utsc.utoronto.ca>

> 投入环境正义的社会学

Cheryl Teelucksingh, Ryerson University, 加拿大



在New Brunswick的反对石油探勘的运动者。

当全球的都市都见证了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兴起的时候，这个潮流似乎也到了多伦多，这或许令人惊讶，因为多伦多是世界上最多元文化和有最好与最坏状况的都市之一。

去年，许多都市都发生了抗议，多伦多也不例外。全球的抗议包括了2016年美国选举的前后，美国Flint市的水资源危机，大规模的本土抗议在Standing Rock原住民区和北达可他石油管线布置，Black Lives Matter (BLM) 的挑战等等。这些都是由千禧年世代在社会媒体或是街头上所发起的。

类似的运动和动员也在多伦多发生了。多伦多的多数人口是在国外出生和有色人群。对某些人来说，是很惊讶看到了种族主义世界在这个多元文化的都市中发生。多伦多的BLM延

迟了同志大游行，抗议警察暴力，而泰米尔人的难民也封阻了公路，抗议社会和空间的种族隔离问题。

社会学不是把这些世界看成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紧张和要求运动与改革，社会学家应该要看到这些运动的连结，议题的相关性，以及政策改革的急迫性。我认为环境正义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大框架。

环境正义是一个理论框架也是一个社会运动。其找的是结合社会正义到环境运动之中。透过深化传统排他的环境保存取径，带到更包容的环境主义，环境正义统合了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广泛问题，包括健康、住宅、都市规划、警察等。

作为一种运动的取径，环境正义利用了和民权运动有关的抗议策略：封阻、请愿、媒

>>

体等，诉求进步的社会环境政策。被 Robert Bullard 的研究所启发，环境正义变成了小区导向的社会学范例，对于今天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问题是具有响应性与相关性的。

在更早期的形式，环境正义聚焦在彰显空间的不平等分配与风险，特别是那些边缘化、种族化、低收入、原住民人口。加拿大的这个过程包括了强制给不好的基础设施的殖民遗绪命名但却没有取得原住民的同意。这样说来，对于权利、健康、风险的生态系统的关怀开启了各种正义议题的连结，并且让原住民的抗议石油管线经过北达可他州的 Standing Rock 有更明显的理由。

在都市中心的环境正义，包括多伦多，已经提供了现状问题的一种分析架构，可以去找出不平等发展问题的解答。这样的潮流连结到了系统化的对于种族化的低收入社群的遗弃，导致产生更少的绿地和更少的健康食物，我们也没有负担得起的房屋，平价的公共交通，但是却有更多的警察和污名。

加拿大的环境社会学家，像是其他国家的一样，是在探讨环境的 NGO、媒体、政策怎么看待与回应那些被边缘化的加拿大人的需要。这些研究彰显了环境不正义变成了谁得到资源以及用什么方式得到这些资源。

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和权力分配是可以结合社会运动的主题。多伦多或是世界上的白种人特权是和晶镜、社会、环境利益挂勾的。决策的历史面向已经增强了既有的权力结构、维持了现状的不平等，所以那好的小区改善的时候，不好的小区每况愈下。

最近在多伦多，环境正义被用来当作抗议“Alberta 肮脏石油”的标语。当跨国企业重新把制造业设立于低度发展的国家中的时候，那里的工资低，环境管制松，这种全球化连结了贫穷和种族化的面向，也就是那些在工作场合、家中、小区中最脆弱的群体。

对从事环境正义的社会学家来说，气候变迁是一个全球的议题，在加拿大，气候正义的政治被加拿大对于石油的依赖所复杂化了，石油被认为是经济的推动力，而得利者倾向把气候变迁看成是不相关或是可以管理的议题。相反的，在低度发展的国家却有更多的脆弱群体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他们通常没有好的基础设施，较大的海岸线，并且更依赖渔业，所以气候的影响更直接。因此，加拿大是需要有更多的需要去把全球的影响考虑进去在地的环境决策之中。

合在一起来看，这些例子显示了环境正义至少有三个面向可以让社会学介入。

第一，社会学家要对跨学科取径开放，因为环境正义利用质化、量化、空间、法律等方法，并且从地理学、法律、都市规划、公共卫生、社会学等的理论角度切入。有些环境正义的研究聚焦在发掘那些受到环境风险、种族主义、其他形式压迫的经验和叙事。这些不被看见的经验是研究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第二，社会学必须倡议社会和环境政策的改革，这在政府或是私人部门都要进行。我们对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了解持续在改变，而气候正义的介入需要在地和全球层级的保护，保护那些脆弱的群体，受到健康、经济、环境风险等的影响。

最后，在政策的执行之外，社会学在监督和评价新的政策中也扮演着角色，可以从一个边缘化的群体的角度对待，这是一个可以跨边际的研究角度。借着使用环境正义的视角，社会学家可以帮助强化政策和社会正义世界之建构之间的关系。■

来信寄给 Cheryl Teelucksingh

<teeluck@arts.ryerson.ca>

> 在就像(从未很像)任何其他时代中的社会学

Karen Foster, Dalhousie University, 加拿大



在加拿大Halifax, Nova Scotia的一间屋子。2017年2月。Karen Foster摄影。

对许多人来说，2016年标志了我们所熟悉的时代的终结。代表英国脱欧的民粹主义运动和川普的选举胜利，以及菲律宾的杜特蒂当选总统，威权政府的复辟已经动摇了新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秩序。我们也看到了“假新闻”和对“政治正确”的反动在全球兴起，一个“后事实”时代正在兴起。

事实似乎比不上意见或情绪来得重要。对于“他者”的包容度可说是前所未有的低，并且在重复人类破坏自然的灾难。社会学在这种政治氛围下被嘲笑与轻视，但是若我们应用社会学想象，我们可以看到

隐藏的、细微的希望，并且有头绪知道怎么做。

历史的断裂容易看到，但是持续性却不易发现。社会学家已经找出许多断裂，结束，开始：工作的结束、历史的结束、甚至社会学的结束！但是这些宣称会因为进一步的研究而有所平衡，每个断裂总是有持续性，傅科说得很对：每一刻就像其他时间，也从未像任何其他时间。

社会学家的任务，特别是那些从事历史社会学的学者，是去追溯那些可以连接现在和过去的事件。所以我们可以找到隐藏的原因。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损失我们被迫去怀念，但

是也部份地带着了自身的破坏潜力。重新建造一个以前的社会并不是答案所在。

即使社会学和社会的关系有着明显的改变，透过国家、公民组织、大学等，我们也要有历史和批判的视野。我们的学科的实践和想法和掌权者有着复杂的关系，既不从属于政治，却也不置身事外。

社会学家是二战后美国政府第一批借重的专家人士去决定国家边界。但是许多人，包括芝加哥大学的 W. I. Thomas 被公开羞辱，因为他们的国际主义、国家认同、社会秩序的想法和 Allies 的国际主义观点相左。

重要的是，战后的政策制定圈拒绝了 Thomas 和其他社会学家。那些学者并不会因为要与政府合作而在研究中妥协。他们和穷人、移民、弱势等合作，起起了保护那些群体的制度设计。

社会学和政府与运动的交手有些是很令人愤慨的。像是优生学运动。即使有些历史看起来是好的，像是本世纪中和人力资源关系学派的亲近性，但是社会学也在这个工业社会中的压迫扮演着角色。

那些需要被检视的历史例子是因为若我们害怕威权主义或是法西斯主义的复苏。我们现在担心社会学作为实践，那最会的状况发生的时候，社会学是一个需要检讨、改进、强化专业伦理的学科，才不会让我们的学科为不正义服务。社会学对威权主义很了解，但是从未有办法完全抵抗之。

社会学家必须承认社会学从来不是单一的，也不是隔绝于社会制度和力量之外的。作为知识、方法、理论的多元组成，他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考虑美国总统大选的后果：没人想听社会学的解释，但是社会学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的书《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就分析了川普的支持者，变成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

Hochschild 最新的著作是研究乡村的口，但是却对政策有着很大的意义。政策制定

者若关心边缘群体，那些人因为全球化而受害，那就是要去正视他们受到的伤害。例如，经济成长的渴望所带来的代价，出口导向的经济，以及大就是好的思维。这些都不合时宜了。政策制定者也要看看忽视及提行为、价值、规范、信念等的后果。

大众、学术人、政策制定者都在建立另类的经济思想，也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运动在质疑环境和经济的现状，以及永无止境经济成长。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小区也都致力于把经济成功像是 GDP 等引导了许多政策的标准去稳定化，这样的努力是有可能开启“其他世界”的可能的，虽然他们也可能落入无止尽的恶性循环。

那就是为什么社会学家的的工作没有结束的一天，对于社会学知识的渴求还是存在的。若我们理解到我们的想法已经失焦了，或是我们的学科已经没落了，那我们必须去对于既有的改变有更精准的认识。这样的精确度唯有透过心灵的质地让多元的社会学一致才得以可能：那就是社会学的想象。

来信寄给 Karen Foster
<Karen.Foster@Dal.Ca>

> 动荡时代与媒体的交手

Fuyuki Kurasawa, York University, 加拿大, ISA社会学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RC16)



邀请社会学家多与媒体互动在这个时间点是特别重要的。民粹民族主义和宗教基本教义的盛行让政治人物和名人有理由——一群其实相似性越来越高的人——去公开鄙视专业意见。社会学会遇到政治的敌视和大众的冷淡以对，是因为我们揭露了不方便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和主流的教条违背并将其去正当化，或是中立化（亵渎）那些神圣或是不证自明的一般常识。

要求与媒体互动是与把媒体看成企业与国家权力的工具这样的观点互斥的，也和认为社会学家若上媒体报导就是肤浅与不认真的学者这样的看法相左。过去几年来，有所谓的“如何”与媒体交手的指导手册，或多或少的形塑了一种认

为传统媒体已经被时代抛弃的论点。

无论怎样的真实核心存在于这样的论述之中，放弃与媒体交手会让社会学家失去大众沟通的机会。与媒体交手是重要的，特别是这个时代中，社会学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议题的观点是需要被更多人听见的。

此外，与媒体交手可以成为更好的公共与专业社会学家。其同时让我们可以接触更广泛的想法、意见、经验，也让我们去反省、形塑、表达我们的研究给不熟悉学术语言的观众。

从全球的角度而言，加拿大的经验提供了可贵的一课。其两种语言的公共领域包括且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媒体型态与

社会家的关系。其也说明了两种社会学家参与公共媒体辩论的两种策略取径：专家取径，或是公共知识分子取径。

在英语区的加拿大，就像其它昂格鲁—每州地区，专业社会学是普遍的形式。在这里，媒体主要把社会学当作专家，像是叙利亚难民问题的专家，社交媒体导致的中学霸凌事件的专家等等。同时，就像美国和英国一样，英语区加拿大社会学的位置是低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的，那些领域的学者通常获得媒体更多的注目。

此外，在法语魁北克，社会学的公共角色大过于专业领域，这和拉丁美洲以及欧陆很像，因为社会学有着相对高的社会文化地位与知识地位。社会学家从1960年代开始的“宁静革命”开始就在民族认同和集体认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于是魁北克的社会学家会被看成是博学的公共知识分子。通常记者会问社会学像是“你怎么看待这个议题”类似的问题。

虽然上述的观察是从加拿大的脉络下引申的，社会学的位置性的双重特征——作为专业或是公共领域——是可以普遍化

到期它脉络的。此外，因为风险和报酬是不同的，所以需要不同的媒体互动策略，而且会得到不同的经验。

在英语事业，社会学的正当性比较弱，主要被视为是一种专业领域，有三个建议可以用来推广社会学这个学科。

- 理解你的位置。研究你们国家的媒体场域的意识形态和专业取向，好掌握你如何可以发挥影响力。例如，为什么制作人或是记者会找你，为什么征询你的专业意见，以及你的意见要怎么转换成媒体的形式？

- 拥抱不同的方式。应用媒体社会学中的代表性抽样分析原则到访谈中，特别是你跟比较不知名的媒体像是地方广播电台或是地方报纸接受访谈的时候。这会让你接触到你不熟悉的观众，并且传达出社会学的知识。

意见是廉价的，但是社会学的事实是很难获得的。在社会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各种意见。你的特殊性在于从你的研究发现中和找出事实去反证大众的迷思，也把特殊事件放到可广泛的社会历史的比较脉络之中。

对于像是拉美、欧陆、法语魁北克等地区，社会学家通常是公共知识分子，且媒体也会注意专业意见，我有两个建议：

- 形塑彼此的互动。因为记者通常会有个事先访问，并且重视你的意见，利用这个机会去构思一个故事的轴线与角度。建议不同研究的角度和其他也可以访问的人，然后寄报告、数据、甚至期刊论文或书

籍过去当作后续延伸。

- 注意可能的回馈。因为你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做一个关于世界现状或是因果的论证是很吸引人的，但是我建议把访问拉回到你专业领域的素材。用简明的方式着重在关键点，提供明白易懂的分析。

一个最后的重点是适用在所有环境的：时机是重要的。截止线和一闪即逝的新闻价值是媒体的命脉。你必须找到他们最后的要求和你的行程之间的平衡点。报导员，制作人，编辑等都不会等你有时间才访问你，也不会到了时机错过之后才刊登你的文章。

与其说社会学家应该成为意见领袖或名嘴，不如说我们应该和媒体合作。这让我们去发展作为公共志业和专业学科的社会学的双重目标，这是不同于公共关系、创业等领域的陈腔滥调，也不同于在这个动荡时代总是被视为智慧的机会主义。■

来信寄给 Fuyuki Kurasawa
<kurasawa@yorku.ca>

> 美国的大学

移民议题斗争场域？

Sandra Portocarrero和Francisco Lara García, Columbia University, 美国



美国的大学生要求校园保护无证移民

在2012年6月15日，欧巴马政府宣布了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 政策，允许大约170万的无证移民一小时候进入美国的移民一可以有两年的缓冲期不被遣返。DACA也延长了这些移民的工作许可，提供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许多的美国居民都把这种不担心被遣返视为理所

当然，所以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心灵是平静的，至少在缓冲期是如此。

而川普上台之后，心灵平静转变成了焦虑。恐惧是来自于反移民的修辞充斥着川普的选举策略，如野火一般蔓延开来。立即影响的是DACA受惠者害怕被延长的缓冲期会被取消。但是这种担忧有更进一步的影响：所有的移民都担心新

>>

的移民政策会影响到他们。

这样的恐惧是真的。2017年1月27日，川普签署了行政命令去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的人进入美国。由于这个行政命令中的用语，导致所有类别的移民、包括难民、学生、永久居民等等都被滞留在机场，导致了抗议的爆发。所有的移民突然发现美国政府会质问他们入境的理由，甚至被禁止。国务院甚至限制了上述穆斯林国家的双重国籍人士入境。

一夕之间，影响似乎不只是无证移民而已，还扩大到了所有的移民。虽然西雅图的联邦 District Court 封锁了这指行政命令，整起事件告诉我们的是川普的移民政策将会无差别地一网打尽。这在他的3月6日的新的行政命令中可以得到证明：他又禁止了6个穆斯林国家的人口进入美国，这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国家介入移民政策之一。

没有什么地方比美国的大学更可以看到这样的冲突了。制度上，公立和私立的大学都有着多元异质的族群，包括了老师、行政人员、学生。奥巴马政府的 DACA 政策扩大了这样的多元：DACA 的受惠者可以注册就读大学，加入有着许多国际学生的课堂，选择可能也是移民后代教授所开设的课程。没有其它的制度像大学一样可以聚集那么多阶级、种族、族群背景的人了。

因此，不意外的，许多大学出来反对移民禁令。2月13日，一项由16个包括所有常春藤大学所起草的法案文书进入了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要挑战川普的行政命令。该法律文书说“安全的考虑是可以透过与美国价值兼容的方式表达出来，美国的价值包括了思想和人的自由移动，并且欢迎移民到我们的大学来。”

类似地，美国社会学学会 (ASA) 也在2017年1月30日发布了一向声明，反对川普的

行政命令，并且提出了如何有效进行集体动员的建议。作为社会学家，我们身处在组织的网络中，若我们积极的合作，那么这个网络可以更有影响力。当一个反移民的人当选了总统，那么学术组织将会从观察者转变成行动者，像是 Michael Burawoy 说的，这是当代大学的特殊角色，同时在社会之外与之中，同时观察也参与其中。换句话说，ASA 的声明把社会学场域转换成权力的场域。

社会学将会持续关注校园的移民团体的动态，这是校园内的新的景象。今天，使用并代表移民的组织是为特定经济和教育背景的移民发声的，例如，农业部门会游说争取确保有低廉的农业劳动力和无证移民可使用，而科技业像是硅谷会希望加速高科技人员的聘用，但是美国的大学却是有着独特的潜力去支持移民运动并反对川普的政策。此外，合作的失败也会有教育意义，反省合作的限制和跨校园的集体连带的挑战。

总之，美国公民社会正在响应川普政策的挑战，社会学家将需要更仔细去看大学中跨移民群体的动态。或许现在还太早去评估其重要性为何，但是当时机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办法去理论化美国大学的非寻常位置，记住大学是一个多元利益交织的空间。■

来信寄给

Sandra Veronica Portocarrero

<svp2118@columbia.edu>

Francisco Lara García

<f.laragarcia@columbia.edu>

> 介绍阿根廷 编辑团队

Juan Ignacio Piovani, ISA未来研究委员会(RC07)和逻辑与方法研究委员会(RC33), Pilar Pi Puig和Martín Ur-
tasu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阿根廷

我们于2016年加入了《全球对话》的编辑，接下了之前哥伦比亚 Majo Álvarez Rivadulla 所带领的西班牙文编辑团队。从那时候开始，每期都是机会和挑战，经过数周紧密工作之后，我们取得了许多的成就。

翻译从不简单。就像罗马尼亚团队最近说的，问题之一是那些从来没有被翻译过的新字。虽然西班牙文在英语期刊内并不少见，但是这也是个挑战。西班牙文是21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有着5亿人口，每个地区，每个学术圈都有自己的习惯用语，所以相同的概念会用不同的字词表示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去讨论最“中立”的西班牙文概念为何，或是怎么翻才会比较公平。

然而，语言的多重形式与接受度所带来的复杂性却是超过语言层次的。例如，当要翻译一个英文概念是有明显的对应西班牙文字的时候——自由的 (liberal)——这却是很难的，特别是指涉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选择就是用西班牙文的 liberal 的相对应字。但是在西班牙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liberal 却是有着保守的意涵。另外的一个方式是用 progresista (progressive, 进步的) 去翻，但是在拉美的脉络下，这个字有左派的意义。所以，用 progresista 去描述像是对于家庭价值有着开放态度、但是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军事干预等等类似政策的政治人物了（像是那些已开发国家的自

由派的政策倾向）。所以翻译这种概念的时候需要去更深一层地研究各种的替代翻法和意义。

另外常出现的问题是名词的性别。英文和西班牙文在这点上相当不同。当然我们知道女性运动的重要性，而且《全球对话》也刊登了许多女性主义的文章、性别议题的文章，各个国家都有。许多的批评指出西班牙文（以及其它语言）有性别偏见。所以有些作者，特别是那些处理相关议题的作者会审慎的用写作策略去处理这个议题。但是我们翻的都是其他语言文化脉络下使用英文写作或翻译出来的文章，若是作者在原本的语言下策略地去处理名词的性别偏见的时候就无法彰显出来。

不样其他的编辑团队，我们选择把工作集中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的社会系中的一个小团队。我们一旦收到英文版的文章，Pilar 和 Martín 就会依照主题和兴趣去分配文章。翻译者自己翻译文章然后互相校对，然后 Juan 会全部彻底校对一次。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会得到 Lola Busuttil 的珍贵建议。她会多种语言，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对于西班牙版本相当有帮助。

加入这个《全球对话》的团队学习到了许多，不论在翻译能力上或是社会学议题的接触上都是如此。《全球对话》让我们更认识这个世界，丰富了我们的社会学想象。



Juan Ignacio Piovani 是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社会系的社会研究法教授，也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CONICET, 阿根廷) 的研究员。他在英国的伦敦大学获得社会研究方法与统计的硕士学位，然后在意大利的 Sapienza 罗马大学获得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博士学位。他是阿根廷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rdoba 的博士后研究，也在巴西的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担任过博士后。多年来他研究社会科学方法的历史、逻辑、基础。从 2011 年开始他是阿根廷当代社会研究计划 (PISAC) 的主持人，这是一个整合了 50 所社会科学院校的大型计划。



Pilar Pi Puig 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攻读社会学。她现在是社会科学系的博士生，研究环境社会学，兴趣是都市脉络下的环境、贫穷、不平等。她也在社会系工作，参与了许多研究计划，包括了方法论议题于贫穷和不平等议题中的应用。Pilar 也参与 La Plata 市的贫穷小区的延伸计划，和来自德国 University of Wuppertal 的学者共同合作。



Martín Urtasun 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攻读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系博士生，得到 CONICET 的奖学金。Martín 研究当下的以科技媒介为基础的“强制介入”安全政策，像是都市监视系统。他在理论上受到来自实用主义社会学和科技的社会研究的引导，使用民族志方法。他也对于大众教育感兴趣，并且加入成人的 People's High School 成为老师和运动者，从事社会运动。

来信寄给

Juan Ignacio Piovani <juan.piovani@presi.unlp.edu.ar>

Pilar Pi Puig <pilarpipuig@gmail.com>

Martín Urtasun <martinurtasun@gmail.com>